

榮譽社會科學博士李國寶博士大紫荊勳賢讚辭

顯赫家族成員往往具備一定優勢，但亦要肩負重任，子孫各盡其份，光大門楣，才能福澤綿長。就此而言，李氏家族一直非常順遂。李家自李石朋經營大米業，把越南米輸入香港開始，至今已第四代。李家的生意由李石朋的兒子李冠春奠定根基，李冠春於一九一八年參與創立東亞銀行，是合夥人之一。到李家第四代，中文大學同人自然會想起我們前校長，他曾擔任教育統籌局局長，並且是一位仁心仁術的外科醫生。我們前任校長的兄長，事業成就卓越，游刃於政治、教育，以及本行的銀行業，並皆出類拔萃。我們今天在此表彰的就是這位兄長及其成就。

李國寶於世界大戰前在倫敦出生，早年在香港聖若瑟書院就讀，其後到英國Uppingham School接受教育。這間學校以音樂和提倡通才教育而聞名，李國寶顯然深得兩者薰陶。他其後在劍橋大學的Selwyn學院修讀經濟和法律，並為大學的戲劇俱樂部「劍橋之燈」創作短篇幽默諷刺小品。由於當時很少社交場合能讓男女互相認識——多數女生都是上女子學校，因此李國寶便當上演出經理，租了原為穀物買賣場的劍橋音樂廳作週末表演廳，讓他的音樂家朋友在那裡演出。因此他變得很受歡迎，也是盈利不錯的企業家。李國寶亦展現他創造機會及匯聚人才的全面才能。要創意層出不窮，亦需要有能力製造可發揮創意的條件，財力、組織，缺一不可。要一間大銀行蓬勃發展，首先要創造可供這間銀行蓬勃發展的條件。

條件之一是必須對業務瞭如指掌。在座各位亦當知道，李國寶現領導區內最成功的銀行之一——東亞銀行，並分別自一九八一年及一九九七年起，出任銀行的行政總裁和主席。時光荏苒，早於一九六九年，李國寶既為家庭亦為香港而從英國回來，其時他已是英格蘭及威爾斯特許會計師公會會員，而且是電腦化銀行系統專家。因此他在東亞銀行的第一項任務就是將所有客戶戶口轉移至中央電腦系統。他把終身事業都付予這間銀行，今天的東亞銀行正是他的心血結晶。

他由上述基礎開始，進而擴展至政治、公益領域，並對藝術和教育給予扶助，取得卓越的成就。他是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副主席。一九八五年至二零一二年間，他代表金融功能組別任立法會議員，二零零五至零八年期間獲委任為行政會議成員。二零零五年，他獲英國頒授爵士勳銜，以表彰他對英國教育的貢獻；二零零七年，他獲香港特區政府頒授大紫荊勳章。

以本讚辭之篇幅，實難臚列李國寶博士的事業成就。他是多間上市公司的董事，其中有電訊盈科有限公司、南華早報集團有限公司與香港中華煤氣有限公司。他曾擔任不少外國商業機構的董事局或國際顧問委員會成員，如雅芳產品有限公司、奧地利銀行、滿地可銀行、金寶湯有限公司、Caterpillar Inc、法國農業信貸銀行、Diamler-Benz、德意志銀行、道瓊斯公司、IBM、Rolls-Royce及西屋電氣公司等。他現任香港華商銀行公會有限公司主席。

李博士在金融界固然舉足輕重，他對人道工作和文化事業亦不遺餘力，令李氏家族更添聲譽。他出任聖雅各福群會執行委員會主席數十載，該會為香港貧困家庭、老人及弱能人士

提供服務。他也是救世軍港澳軍區的顧問委員會的主席。李博士魄力過人，單是慈善工作，精力稍遜者已望塵莫及。

除此之外，李博士亦熱心藝術和教育。他是亞洲青年管弦樂團的名譽主席和香港芭蕾舞團永久會長。他提倡藝術的熱忱與當年在劍橋租用音樂廳時的投入並無二致。劍橋歲月念茲在茲，他成立了劍橋之友香港有限公司，並且以該會的菲臘親王獎學金計劃每年資助香港尖子遠赴劍橋。該獎學金自一九八二年成立以來，至今已支持超過一百六十名香港學生到劍橋留學，當中很多現時已成為政府、專業、學術及商業各界的精英。應該補充一點，他是維港彼岸另一所大學的副校監，對頒授榮譽博士銜可說駕輕就熟。

本校自創校始即與李博士及其家族結緣，他自二零一零年起出任善衡書院的院監會成員。書院於二零零六年成立，現已茁壯成長。李博士為書院重要一員，對書院貢獻良多。

文首提及李氏先輩，這個優秀家族的年輕一代在李博士及李夫人教導之下，必會繼承家風，致力維護及促進香港的福祉，李博士當會視此為最大成就。

李國寶博士對香港和世界作出傑出的貢獻，無論在商業、政治、公益、慈善，以及藝術和教育事業均成就卓越。校長閣下，謹請頒授榮譽社會科學博士銜予李國寶博士大紫荊勳賢。

榮譽理學博士Barry James Marshall 教授讚辭

這是個有兩段開場白的故事。第一段是這樣的：從前有個淘氣的男孩，一九五零至六零年代和家人住在西澳洲沙漠一個偏僻的小鎮，在那裡長大。他慫恿弟弟從樹上跳下來，弟弟摔斷了手臂。讓他照顧妹妹，妹妹竟喝了盛在牛奶瓶裡的煤油，他雖懂得打緊急電話求救，把妹妹救了回來——但把那瓶煤油放在妹妹伸手可及處的卻是他。他修理爸爸的電鑽，卻不小心把中線和地線掉轉了，結果爸爸站在濕草地上把電鑽一開，差點被電得送上了太空。

其實男孩也不是真的那麼頑皮：不如說他是個愛好鑽研和頭腦靈活的實驗家，還遺傳了爸爸的巧手。他製作彈弓和炸彈、摩斯密碼收發機、氫氣球泵氣機、槍和收音機；儘管發生了那次煤油事件，他還是個好哥哥，父母都以他為榮。

他的爸爸以製件和裝嵌為業，在當地是受人尊敬的機械師，不過媽媽希望她的孩子上大學讀書，於是一家移居到柏斯。上大學的時候，男孩也許受了早年的興趣和爸爸的事業所影響，想當一名電機工程師。可惜他的微積分成績未符理想，結果他選了醫科。這個男孩就是 Barry Marshall。

第二段開場白是這樣的：從前有一種腸胃細菌，受過確診或初斯消化性潰瘍折磨的人，都不會忘記那種胃部纏綿不去的火炙般痛楚。直至一九八零年代中期，有關治療方法一般不離戒吃辛辣或者酸的食物、吃抗酸片和盡量減輕壓力。但只能收一時之效。很多人一生都受潰瘍之苦，有些甚至惡化成胃癌。不過現在只需服用一個療程的抗生素，便可把問題解決。消化性潰瘍由一種名為「幽門螺旋桿菌」的細菌引致，是腸胃病學歷史上最重大的發現；而且這項發現更影響其他方面的研究，例如：癌病研究和免疫學。

不過這項發現和其他逆轉乾坤的科學創見遭遇相同，甫發表即招來科學界幾乎一致的抵制與詰問。科學之為科學，在於力求證明科學假設之謬誤，所以有時候即使是最好的發現也很難為大家接受。兩位發現幽門螺旋桿菌的科學家從一九八一到一九八四年熬了三年，讓他們懊喪不已。他們必須做點事情來說服同行，但以動物模式做實驗又行不通。

本故事的兩段開場白就在這裡接上。文首那個頑皮但機敏的孩子，雖然他慫恿弟弟從樹上跳下來看看會怎麼樣，差點要了弟弟的命；救了誤喝不應喝的東西而幾乎喪命的妹妹；修理爸爸的工具時幫了倒忙，把自己的爸爸電個半死，但只有這個男孩才會想到以自己的身體進行實驗來證明他的醫學假設，亦因此解脫了千百萬人的長期痛苦以至死亡風險。Barry Marshall 就是上述的其中一位科學家，在他決定以自己身體進行實驗時，已注定留名青史。他在自傳裡記述，他一向都和太太談論工作，但這一次他沒有告訴太太他會這樣做，因為「這是那種請求諒解較請求允許容易的時候」。他先進行了一次基礎內窺鏡檢查，接著喝下一個培養碟分量的細菌，自行感染了幽門螺旋桿菌，沒多久便病發，情況嚴重，然而兩星期後他把自己治癒了。

故事至此仍尚未完結，因為這位科學家還要宣傳研究成果和說服相關的行內人，不過這次以自己作為實驗對象成為最關鍵的轉捩點。新聞記者一哄而起，爭相報道，數以百計的病人看到報道後紛紛聯絡他，向他求醫。接著寶潔的資助來了，還有維珍尼亞大學的一所實驗室亦表示支持，Marshall 教授也在這所實驗室工作了十年。這期間報章和電視不斷談論這項研究；英國廣播公司的《Ulcer Wars》電視節目到今天仍在世界各地及於YouTube 網站免費播映。最後在一九九四年，美國國家衛生研究院發表公告：「治療十二指腸和胃部潰瘍的關鍵在於檢測和根除幽門螺旋桿菌。」同年，世界衛生組織也接受幽門螺旋桿菌是引致胃癌的原因之一。那個愛冒險的男孩的假設和實驗終於獲醫學界正式接受。他的發現可媲美小兒麻痺疫苗的發展和天花的根治。

Marshall 教授沒多久便回到柏斯，和太太一直住在那裡。他們有四個孩子和五個孫。一九九九年，他成為英國皇家學會院士和澳洲科學院院士；二零零八年獲選為美國國家科學院外籍院士。他也是中國工程學院外籍院士。二零零七年，他獲頒授Companion in the General Division of the Order of Australia 勳章。二零零五年，Barry Marshall 和 Robin Warren 一起獲得諾貝爾生理或醫學獎，以表彰他們「發現幽門螺旋桿菌，以及這種細菌對胃炎和消化性潰瘍的影響」。

校長閣下，為表揚Barry James Marshall 教授對人類健康有獨一無二並具歷史性的貢獻，謹請頒授榮譽理學博士銜予Barry James Marshall 教授。

榮譽社會科學博士杜葉錫恩博士大紫荊勳賢讚辭

《詩經·小雅·鶴鳴》說：「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意謂別山片石，亦可用以琢磨此山璞玉，比喻他國賢才可以為本國效力，無分彼此。香港華洋雜處，中西薈萃，百年以來，展現璀璨多姿的文化面貌，躋身國際大都會之列，外籍居港人士多有貢獻。此中又不乏仁德智者，熱心照顧貧苦大眾，摒棄國籍、文化之差異，甘作他山之石，為香港草根階層奉獻所有，畢生為苦學孩童切磋琢磨，暮年之時，樂見璞玉成器，老懷安慰。

杜葉錫恩博士一九一三年六月生於英國泰恩河畔一個工人階級家庭，長大後於英國杜倫大學取得文學士學位，與第一任丈夫威廉到中國內地傳教，一九五一年來港，隨即與香港結下不解之緣，與港人休戚與共，迄今六十二載，不離不棄。杜博士乃香港著名社會運動先驅，一九六三至九五年出任市政局議員，一九八八至九五年出任立法局議員，一九九七至九八年獲委任為臨時立法會議員。杜博士致力維護社會公義，正直敢言，為弱勢社群爭取權益，備受勞苦大眾愛戴。她有感於六十年代社會貪腐，多次在報章上撰文，又接受傳媒訪問，痛詆當時殖民政府施政失當，鞭辟入裏，貪官污吏聞之汗顏。出任市政局及立法局議員期間，杜博士經常與當時殖民政府抗爭，逼使政府正視各部門日益惡化的貪污問題，最終促成港英政府於一九七四年正式成立廉政公署，匡謬正俗，肅貪倡廉。自此香港奉行廉潔政治，並在國際上贏得美名，被譽為當今最廉潔的國際都會之一，廉政亦為港人最珍惜的核心價值。杜博士多年來犯顏諫諍，鍥而不捨，居功至偉。

杜博士厭惡社會貪腐，為求改善社會環境，為民生解困，深知必須從教育啟始，方能改善貧苦大眾之生活條件，遂於一九五五年於觀塘啟業村荒廢農地之上，於英軍棄置之舊帳篷內，下帷講學，創立慕光英文書院，為草根階層子女提供教育機會，蒼生在念，痼疾在抱，明德新民，木鐸鏗鏘。慕光書院校訓標舉「明理愛光」，訓勉莘莘學子讀書明理，通過追求知識，建設光明社會；校歌歌詞「社會因教育而光明」，正為杜博士教育理念的寫照。慕光書院創校以來，杜博士親力親為，杏壇講學，言教身教，幾近六十寒暑，春風時雨，教澤功深，無數貧困孩童得蒙沾溉，桃李芳菲，德澤廣被。杜博士現今仍出任慕光書院校監，以學校宿舍為家，校內教師聘約均由她親自簽署。雖然以輪椅代步，右耳年老不靈，然而每當談及校務發展，杜博士即興致勃勃，尤其關涉貧苦學生之資助方法，杜博士深思熟慮，出謀獻策，「這裏一千三百位學生，超過一半來自基層家庭，若學生因經濟問題難以支付課外活動及學校旅行費用，我們會獲額外資助，所有受資助學生名單保密。」二零一三年杜博士百歲壽辰，慕光書院歷屆校友特意成立「杜葉錫恩教育基金會」，秉承杜博士終身服務市民之精神，資助本港教育事業，回饋社會。

杜葉錫恩博士半世紀以來定居香港，既練就一口流麗的普通話和廣東話，也締結一段中西諧合的美好姻緣。杜葉錫恩在教會認識了杜學魁先生，兩人均對教育事業懷抱熱誠，也同時樂於服務市民，理想相同，心意相通。一九八五年，正式結為夫婦，杜葉錫恩之名，由此而起。二零零一年，杜學魁先生因癌病離世，杜葉錫恩博士憶述亡夫平生，嘗言：「杜學魁是我生平唯

一遇到的一個跟我理想接近的人，直到今天還是，我對他的敬愛二十五年來都沒改變過……從他那裡我學會了許多東西，比我以前在學校和當老師所學到的更多。我教他英文，他教我中文，我發現和他談話，彷彿就像在老家跟父親和弟弟談話一樣……杜使我恢復了過去年輕時候，未給教條束縛之前的理想。」可見兩人志同道合，鶼鶼情深。杜學魁先生離逝後，杜葉錫恩博士將情感寄寓於著述之中，出版《我眼中的殖民時代香港》，以一貫敢言作風，回顧過去黑暗歲月；新作 *Shouting at the Mountain*，則記述與杜學魁先生的愛情故事，被《南華早報》評為「香港最感人的愛情故事書」。

杜葉錫恩博士無私奉獻，服務市民，一九七六年獲菲律賓政府頒授有亞洲諾貝爾獎之稱的拉蒙·麥格賽賽獎，一九七七年獲頒英帝國司令勳章，並獲多間香港和英國大學頒授榮譽博士學位，包括香港大學（一九八八年）、香港公開進修學院（現為香港公開大學，一九九四年）、香港理工大學（一九九四年）、英國杜倫大學（一九九六年）和英國紐卡素大學（一九九六年）。回歸後，杜博士獲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頒授大紫荊勳章（一九九七年），以表揚她畢生服務香港基層，貢獻豐碩。二零一零年，獲評選為「感動香港十大人物」。

杜葉錫恩博士畢生關顧基層市民，興學育才，推動香港社會邁步向前，卓然有成，貢獻良多。她對香港草根階層所賦予的情感，早已跨越民族、國籍、地域、語言的界限，成功締造仁愛共融的社會環境。校長閣下，讓我們共同表揚這份跨世紀的真摯情誼，請頒授榮譽社會科學博士銜予杜葉錫恩博士大紫荊勳賢。

此讚辭由何志華教授撰寫

榮譽法學博士黃仁龍先生大紫荊勳賢讚辭

古希臘哲學家亞里士多德倡言法治理念，嘗言：「法律應當統治。法治比任何個人管治更好。」強調法治凌駕一切統治皇權，是為法治精神的肇始。一九九七年香港回歸中國，法治精神成為香港政治制度的基石，亦為香港社會奉為主臬的核心價值，而律政司司長作為行政長官、政府機關的首席法律顧問，肩負本港刑事案件的檢控工作，保護社會公眾人權利益，儼然成為香港法治精神的代表，全港司法人員的表率，動見瞻觀，任重道遠，敢於承擔此職而又能有所建樹者，必須既有卓越不凡的法律專長，亦對香港社會懷有由衷而真摯的情感。

黃仁龍先生祖籍廣東潮州，一九六三年十月生於香港，是家中長子。父親黃鑑烈先生於灣仔街頭販賣雪糕、汽水為生，務實耿直，不賭不借，克勤克儉，以微薄收入養活家人，安貧樂道，重視兒女教育，於困頓之中，望子成龍。黃仁龍作為家中長子，深明父親期望，幼年即努力向學，課餘協助父親搬運汽水，甚至街頭叫賣，不辭勞苦。

仁龍先生天資聰敏，勤奮向學，自幼學業成績出眾，以優異公開試成績考入皇仁書院，名列前茅，每年囊括書院多項獎學金，曾當選該校總領袖生，文史成績尤其卓異，課餘參加辯論比賽，才思橫溢，言辯滔滔，早著令譽。仁龍先生少懷大志，曾於皇仁校刊撰文，痛陳港人回歸後缺乏歸屬感，深以為憾。為求闢顧社會基層生活，保障人權利益，中三立志選讀文科，以利將來攻讀法律，彰顯公義。皇仁書院素以理科聞名，學生成績優異者皆選讀理科，皇仁中學校長為此召見仁龍先生，勸以三思。仁龍先生志向堅定，不為所動，終以中學會考七優成績，並高級程度會考三優一良，獲頒菲臘親王獎學金，負笈英倫，於劍橋大學麥格達倫學院攻讀法律。置身世界權威學府，面對歐美頂尖學生，黃仁龍勤勉治學，圖書館徹夜溫習，寒窗苦讀，排除萬難，以優異成績獲劍橋大學頒授學士及碩士學位。一九八七年，獲認許為英國大律師，同年獲認許為香港執業大律師；二零零二年，仁龍先生年僅三十八歲，即在香港奉委為資深大律師；二零零七年，獲中殿律師學院選為委員；二零零九年，獲頒劍橋大學麥格達倫學院榮譽院士銜。學問修為，斐然可觀；凌雲壯志，終底於成。

《學記》云：「君子如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學乎。」強調為政者必先為學，學業有成，方能明德新民。仁龍先生英倫學成歸來，師從香港特區終審法院首席大法官李國能先生，深悟執中無偏、為民請命之理，樂於服務社會，曾任香港高等法院原訟法庭暫委法官及出任香港大律師公會法律教育委員會主席。二零零五年十月七日，香港特區原律政司司長梁愛詩請辭，特區政府旋即接觸仁龍先生，他以一貫謙卑自持的態度反思應否接受聘任，深慮律政司職務於維護法治精神之意義，為求彰顯社會公義，最終欣然允諾，成為香港有史以來最年輕的律政司司長。消息公佈，傳媒追訪，詳記黃仁龍先生的成長歷程。他的奮鬥事蹟，被喻為「香港故事」，社會賢達、市民大眾無不知曉。

九七回歸中國，香港依據《基本法》實行「一國兩制」，高度自治。然而，《基本法》第一五八條第一款同時列明，《基本法》的解釋權屬於全國人大常委會。

二零零八年五月十五日，美國禿鷹基金向香港法院申請簽發對剛果的原訴傳票，意欲啟動香港法院司法程序以強制執行外國仲裁機構就剛果政府的欠款作出的仲裁裁決，高等法院原訟法庭裁定原告可向剛果送達原訴傳票。二零零八年七月七日，剛果以享有國家豁免權為由，主張香港法院對剛果沒有管轄權，要求撤銷原判。原告與被告旋即就回歸後香港普通法是否實行絕對豁免制度展開爭辯，黃仁龍司長深明此案關係憲制問題，稍一大意，將引發香港法律界的激烈爭論，有可能動搖本港法治信心。黃仁龍司長作為介入人既需尊重香港法院司法獨立，同時亦得考慮此案已涉及國家主權問題，怎樣貫徹基本法所訂的新憲制秩序，此案頓成嚴峻的考驗。二零一一年六月八日，案件在香港終審法院終極論斷，終審法院以三比二多數票作出臨時判決，「在不抵觸全國人大常委會就上述條文所作出的解釋的情況下，香港特區法院對本訴訟的第一被告人剛果沒有司法管轄權。」終審法院作出臨時判決後，再根據基本法將判令提請全國人大常委會審議。二零一一年八月二十六日，全國人大常委會作出解釋，確認香港終審法院的判決。整件案件的處理和發展，充分尊重香港終審法院司法獨立原則，同時體現人大常委依據《基本法》可以詮釋法律之地位，締造雙贏結局，同時，此案亦加深國家當局與香港司法機關相互之間的了解和信任，轉危為機，化危為安。特區終審法院宣判當日，維港兩岸雲淡風輕，港人生活一如既往，黃仁龍司長依然慎言縝密，沉實低調，展現智者功成不居的氣度。

黃仁龍任內致力加強與海外司法機構的聯繫，成功遊說海牙國際私法會議在香港設立亞太區域辦事處，彰顯香港在訴訟方面的國際聲譽。他又領導跨界別專責小組，推廣調解仲裁的多元應用，訂定《調解條例》，提升香港作為爭議解決中心的國際地位，功在千秋。

黃仁龍出身寒微，事業有成之時，不忘關懷弱勢社群。一九九一年，他加入基督教會創辦的「基督教關懷無家者協會」，每週探望露宿者，聊天佈道，樂此不疲，甚至為露宿者剃鬚剪髮，關懷備至。一九九六年，與劍橋師妹陳筱茵女士結成連理，兩人將婚禮所收數十萬港幣禮金，慷慨捐贈「基督教關懷無家者協會」，樂善好施，情義溫厚。黃仁龍亦關注青少年吸毒問題，曾親自領導政府高層次跨部門專責小組，全面制定防止青少年濫藥的政策，又關懷窮困家庭青少年問題，經常鼓勵他們面對逆境，發奮圖強。

今天當我們為香港中文大學成立五十周年而深感欣慰之時，也讓我們為五十年前同月出生的黃仁龍先生感到驕傲，他出生於草根階層，努力向學而卓然有成，敢於承擔並回饋社會，在律政司七年任內，他為基本法之有效落實，本港法治精神之成功維護，作出卓越的貢獻。他的奮鬥事跡，是最動人心弦的香港故事，對香港無數貧苦大眾，尤其苦學青年，具備教化啟迪意義。校長閣下，請頒授榮譽法學博士銜予黃仁龍先生大紫荊勳賢。

榮譽理學博士鍾南山院士讚辭

杏林聖手，抗疫將軍；仁心仁術，化雨春風；科研卓越，名傳刺針；道德楷模，國人典範。正是：巍巍高山，崢嶸風骨；粵之有南山兮，五嶽遜色！扁鵲之再生兮，自歎弗如！

鍾南山院士，廣東醫療界之領導，科研界之翹楚。一九九二年至二零零二年他擔任廣州醫學院院長，一九九六年榮膺中國工程院院士。鍾院士現今是廣州醫科大學內科教授、呼吸疾病國家重點實驗室主任及呼吸疾病國家臨床研究中心主任。

鍾南山，祖籍福建廈門，一九三六年中日戰爭前夕生於南京。父母早年留學美國，父親鍾世藩是中山醫科大學教授。鍾南山幼承庭訓，自小在家耳濡目染，很早就對醫學產生興趣。一九五五年，鍾南山考上了北京醫學院，一九六零年畢業。但由於當時中國的政治和社會變動，他一面習醫，一面參與社會工作，他自己說：「我當過農民，幹過宣傳隊，當過鍋爐工人，北醫校報的編輯，什麼都幹過。」這些艱苦的歲月 and 不同經驗的磨練，都成為鍾南山院士日後行醫、教學和研究的動力。

一九七一年，鍾南山回到闊別多年的廣州，從事醫療及科研工作，最終成為呼吸疾病的專家。一九七九至一九八一年間，他遠赴英國愛丁堡大學及倫敦大學，到醫學院呼吸系深造及研修，並參與研究工作。期間他對研究的堅持和突破，以及對實驗的認真和執著，深深地感動了他的英國導師、團隊和友人。

鍾南山回國後，主要從事呼吸疾病的臨床、教學和科研工作，先後主持國家九七三、八六三、「十五」「十一五」「十二五」科技攻關，和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重點項目。他的研究成果卓越，屢獲殊榮。在海外學術期刊發表的重要論文逾五十篇，其中包括*Nature Medicine*、*The 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Lancet*、*British Medical Journal* 及 *American Journal of Respiratory and Critical Care Medicine* 等國際權威刊物，而二零零八年在*Lancet* 上發表的關於預防慢性肺阻塞性病患者急性發作藥物羧甲司坦的文章，更引起國際醫學界巨大的迴響；至於鍾教授在國內國家級雜誌上發表的論文，數目更多，超過了二百篇，奠定了他在中國呼吸疾病研究領域中的領先地位。此外，他還出版了專書十六本，及獲得專利九項；期間他亦獲得國家科技進步二等獎、三等獎，廣東科技進步特等獎、何梁何利獎、吳揚特別貢獻獎等二十餘項科技成果獎。二零零七年及二零一一年，英國愛丁堡大學和伯明翰大學為了表揚他在醫學上的傑出貢獻，分別頒授予榮譽博士銜。

鍾南山院士之最為人稱道者，是他在二零零三年帶領中國醫療人員對抗「非典」疫症的貢獻。十年前的春天，非典疫情肆虐神州，而香港則沙士圍城，由於致病病源不明，散播地區廣泛，傳染途徑急速，兼且沒有找到治療的特效藥物，以致死亡陰霾籠罩，全港全國全球都人心惶惶，憂心忡忡。幸而，最困難的時候有勇士出，最黑暗的時候有曙光現，本港有「沙士英雄」沈祖堯，國內則有「抗擊非典第一功臣」鍾南山。鍾南山院士提出了「三早三合理」的說法，即是「早診斷、早隔離、早治療」，成效顯著，把許多病人從死亡的邊沿上

搶救回來。有人稱讚他奮不顧身，把自己的安危置於度外，鍾院士聽後，付之一笑，說：「我們就是搞這行的，不幹誰幹？」在鍾南山及其醫療團隊領導之下，廣東省創下非典患者在全國死亡率最低、治癒率最高的佳績。二零零三年六月，廣東省舉行「抗擊非典表彰先進大會」，鍾南山是唯一被授予特等功勳的人。這一年，他還榮獲全國五一勞動獎章、白求恩獎章，以及被選為感動中國二零零三年度人物。二零零九年H1N1爆發，以至今年H7N9肆虐，他都投入抗疫的前線，率領醫療人員奮戰甲型流感，雖年屆七十有七，仍身先士卒，永不言倦。

鍾南山院士除了在醫療、抗疫和科研上取得傑出的成就，也是個以身教人、以德服眾的好教授，好老師。他連續多年獲得南粵傑出教師獎，二零零三年獲得華源醫德醫風獎，二零零七年獲得全國道德模範獎，以及於二零零九年獲得高等學校教學名師獎、國家級教學成果獎等。他強調醫學教育中德育的重要，並以身作則弘揚「醫德就是想方設法解決病人的實際困難」的價值觀。他的「南山風格」就是「奉獻、開拓、鑽研、合群」作為醫生、教授、科研人員，他始終堅持關懷社會，愛護群眾，不平則鳴，卻又嚴謹獨立，絕不墨守成規。

鍾南山院士與香港中文大學醫學院有緊密的合作及交流，尤其在沙士的抗疫及結核病耐藥研究方面，雙方透過合作分析尋求治療對策。鍾南山曾出任中大逸夫書院「邵逸夫爵士傑出訪問學人」，分享抗疫心得及經驗，為師生帶來啟迪。鍾南山院士與中大抱有相同的教育理念，並十分支持中大在內地的發展。中大在二零零九年開始探討在深圳辦學，期望把中大的理念及人文精神帶入內地，為國家培養具有國際視野、專業知識、高尚品格及對社會有承擔的人才。今年三月，中大與深圳市人民政府及深圳大學簽訂了最終的辦學協議，並組成香港中文大學（深圳）理事會，鍾南山院士擔任理事會成員，為中大深圳校園的發展出謀獻策，帶領大學穩步向前。

為了表揚鍾南山院士在抗擊非典一役的功勞，以及他多年來在醫學界、科技界和教育界所作的努力和卓越成就，本人謹請校長閣下頒授予鍾南山教授榮譽理學博士銜。

此讚辭由梁元生教授撰寫